

約·拉甫列茨基著

梵帝岡

宗教、財政与政治

世界知識出版社

約·拉甫列茨基著

梵蒂岡

宗教、財政与政治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北京

61DA17113

И. ЛАВРЕЦКИЙ

ВАТИКАН

РЕЛИГИЯ,

ФИНАНСЫ

И

ПОЛИТИ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 1957 年版译出

梵蒂岡

宗教、財政与政治

〔苏〕約·拉甫列茨基著

柔·水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9\frac{1}{2}$ · 字数 233,000

1959 年 5 月第 1 版

195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定价 1.00 元

統一書号 3003·391

目 录

緒言	1
第一章 封建时代教皇的經濟活动	13
第二章 天主教教会在殖民地(十六至十八世紀)	54
第三章 梵蒂岡走向資本主义	89
第四章 羅馬教皇厅及其金融势力	130
第五章 梵蒂岡的政治蜘蛛网	179
第六章 美国的天主教	213
第七章 天主教陣营內的危机	249

緒 言

曾經以上帝榮耀的靈光庇護過封建制度的羅馬教廷，在資本主義時代繼續保護着剝削階級的利益。現代的梵蒂岡不僅是宗教中心，它在經濟和政治利益上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有着聯繫。為教廷鼓勵着的有勢力的教權派政黨，現在在西歐活動着。其中的許多政黨，在最近十年間曾經或目前仍掌握着政權（意大利，法國，西德，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奧地利）。天主教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反動政權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在美國，天主教會愈來愈甚地得到金融寡頭的支持。天主教會拉丁美洲，亞洲和澳大利亞，積極地擴張自己的勢力。

根據這些事實，梵蒂岡過去的和現時的活動經常受到關注，是可以理解的。西歐各國和美國以此為題的書籍愈來愈多，就是這種關注的表現之一。各式各樣的稱頌梵蒂岡的書籍，數量特別眾多。

教會的頌揚者們否認教權派在大戰後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功應該歸功於資產階級的支持，因為資產階級看出教會在社會上所進行的蠱惑性宣傳，是和共產主義影響作鬥爭的最有效的武器。教會的頌揚者們斷言戰後教權派在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功，証明了在群眾間教會的“新生”和“宗教復興”。但是沒有事實証實這一論據。今天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教徒，要比過去任何時期為少。關於這一點，教會人士自己也寫到和說到。1947

年法国枢密紅衣主教修尔在致教廷的諮文中——其上有一个动听的标题“教会能忍受住最后掙扎嗎？”——写道：“在現代无神論所有激烈攻击教会的言論中，我們坦白地承認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信仰衰落了”^①。修尔接着以下面的論調来安慰自己，即宗教信仰衰落現象不仅在天主教教徒占优势的国家里发现，其他各国也如此，这种現象是“所有阶级和所有种族”所固有的。

彼得罗·巴比里神父——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一位顧問——也发表同样的意見，他在梵蒂岡出版的“观念”杂志中写道：“信奉自己的信仰和經常上教堂的信徒正在减少这一事实，客观的观察不会看不見；社会广大阶层不奉行宗教仪式和上教堂的情形在各国不一样，在同一国家的各个区域其发展程度亦各异——因此，不能不分皂白地同样对待；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对于一些民族來說这事实是无可爭辯的。”^②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俄国劳动人民从資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向全世界被剝削者証明了摆脱不合理制度的可能。苏联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更加强了資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心。西方劳动群众今日期望改善自己的境况，不是依靠上帝和教会，而是依靠和資本家斗争的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談論宗教的复兴等于以願望代替现实。

虽然有宗教复兴这种奇談怪論，实际上梵蒂岡本身也无力巩固教会在群众間的影响。这本来不是秘密，当梵蒂岡在行动上成为保卫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反共为自己的主要标志后，許多劳动群众就厌弃了教会。教权派政党的执政，使教徒們有权利要求教会不但賜与“天国”并且要求滿足人們在现实世界上的日常需要。尽管教权派和教会控制着西欧一些大国的国家机

① 修尔：“教会能忍受住最后掙扎嗎？”，羅馬，1948年，第59頁。

② 彼得罗·巴比里：“宗教的不安与可信賴的宗教”（載“观念”，羅馬，1955年1月，第33頁）。

器，仍然沒有能力滿足群眾的期望——群眾不問政治或宗教觀點如何一致要求和平、進步和社會公平。可是不能說阿登納、皮杜爾和謝爾巴這三位西歐教權派最權威的代表人物，也表達了上面所列举的理想。大家知道，在國際關係上他們曾經是和現在仍舊是“冷戰”的支持者，在內政問題上是“強硬政策”的執行者。然而今天這種路線在教權派本身的陣營內引起了愈來愈大的不滿，這有許多事實證明，意大利、法國和西德的報刊差不多每天都有這種報道。

當進步陣營的代表人物指出：在天主教的工會、政黨和其他群眾性組織，以及在天主教的知識分子隊伍中，爭取一切善良人們的團結、擁護和平共處政策、擁護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爭取殖民地各民族獲得自由的呼聲愈來愈雄壯時，梵蒂岡的刊物惱怒了。梵蒂岡的刊物斷言左翼分子企圖用這種方法把信教群眾和他們的神父隔離開來，斷言左翼分子感興趣的只有一點：破壞梵蒂岡在教徒心目中的威望。

不言而喻，在這些斷言中沒有一點真實。只要提一件事就夠了，羅馬教皇在1955年的聖誕文告中表示贊成停止試驗原子武器，得到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報紙的廣泛反應。這種證明進步陣營以客觀態度對待梵蒂岡的事實，還可以舉出許多來。

但是梵蒂岡繼續和國際反动勢力最侵略性的集團一起，聯合反對社會主義陣營。教皇在1956年不止一次地煽動波蘭、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天主教徒反抗政府。全世界都知道，梵蒂岡委派在匈牙利的紅衣主教明曾蒂，是1956年反革命暴亂的首魁之一。梵蒂岡刊物一貫地歪曲蘇聯的和平政策，把蘇聯政府在國際舞台上每一個愛好和平的行動，說成是“宣傳”。

我們可舉這一事實為例。庇護十二世在致1956年在科隆舉行的全德天主教77屆大會的信函中，支持阿登納總理的侵略政策，並且不顧事實，硬說教會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在同一信函中，羅馬教皇號召天主教教徒不要相信“和平共

处的海市蜃楼”。难道这不是号召繼續进行今天为每一个正直的人，不論其哲学或宗教观点如何，所指責和憎恶的“冷战”嗎？

但是，梵蒂岡今日的首腦人物們对早已破产了的“冷战”政策的偏爱，和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的仇恨，毫不意味着所有的天主教教徒，甚至于天主教教会所有的主教，都同意这一路綫。

現代天主教思想著名的代表約瑟夫·馬廸写道：“天主教教会的存在决定于它善于适应新的历史条件”^①。今天的“新的历史条件”，首先就是差不多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号召“消灭”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僧侶們，早應該認清这一事实，并且从而作出相应的結論。

* * *

在現代的进步書籍中，苏联的和国外的，有不少著作是从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梵蒂岡的各方面活动的；例如梵蒂岡的外交政策，其代理人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反人民罪行，耶穌会的历史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关于梵蒂岡及天主教教会和統治階級，特别是和金融資本的具体联系这一問題，研討得最为不够。

同时我們知道，列宁即認為这一問題有着重大意义。在“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写道：“凡屬包含有許多具体事实与比照，能把現代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階級組織与宗教团体和宗教宣传机关間的联系揭示出来的書籍和小冊子，都是我們特別必須利用的。

凡关于美国的一切材料都极为重要，因为那里宗教同資本发生的正式官場国家联系，还表現得不甚明显，但是另一方面，那里却又令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所謂‘現代的民主制度’，不过是表示可以自由宣传有利于資產階級的东西，而对資產階級有利的东西却是最反动的思想、宗教、黑暗观念，为剝削階級作辯护等等。”^②

① 馬廸編纂：“教会与社会”（天主教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1789—1950），紐約，1953年，第95頁。

根据列宁上述的指示，本書作者試圖闡明梵蒂岡的至今尚不失却其现实意义的历史的各主要阶段及其在現代的活动。作者不仅仅引据用馬克思主义观点和用資產階級观点編纂的史料，在相当程度上也引据教权派編纂的史料，适当地将其特点介紹給讀者。

大家知道十八世紀伟大的启蒙者們的著作和十九世紀进步学者和历史学家們的著作，給予教廷的頌揚者們一个打击，他們把教廷描摹成系出于神意而产生的理想組織。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扩展，强烈地动摇了天主教和教廷所占有的陣地。从十九世紀下半叶开始，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和保卫資本主义制度原則便成为天主教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中心任务。

以科学态度批判宗教、天主教的哲学和历史的胜利，迫使梵蒂岡以自己的历史学者們出場应战，这些学者們似乎能从“科学”立場上来捍卫教会的利益和威望。于是世界上就出現了一个現代天主教(教权派)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任务是以伪历史方法将教会的历史理想化。

这一学派的鼓励者是里夫十三世，第一个浸透資產階級思想的教皇。

教权派历史学派是如何体现里夫十三世的意图的呢？这可以根据这一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德国人路德維希·馮·巴斯托尔(1854—1928)的例子来判断，他根据里夫十三世的提議，写有共十六卷的教廷历史^②。和巴斯托尔共事的有一些耶穌会会徒为他提供为教廷辯护所需的文件和論据。从篇幅的浩繁和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來說，巴斯托尔的著作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5—206頁（俄文版）。（譯文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460頁。——譯者）

③ 路德維希·馮·巴斯托尔：“中世紀后的教廷史(XV—XVIII)”，第一卷至第十六卷，夫蘭堡 1886—1933 年。

然而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作品。巴斯托尔并不否认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些教皇道德败坏的事实，如西克斯脱四世、亚历山大六世、里夫十世等；但是巴斯托尔断言他们的败行是时代所特有的，不是教会所特有的。巴斯托尔把教皇在文化、政治和外交上的活动加以美化，他赞扬反对宗教改革，称颂耶稣会。他对教会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物质联系讳而不言，对加以分析后会显出教廷真面目和降低梵蒂冈威望的其他许多问题避而不谈。巴斯托尔违背历史真理，企图证明，不管天主教教会有着一切的“弱点”，它是人类社会所需的和有益的机构。他在十六世纪耶稣会的诡辩家培拉尔明的论据上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培拉尔明说：假使教会由品质优秀的神职人员主持时，那末教会命运的经久不衰可以解释成由于他们的贤明所致，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若由道德败坏的神父领导着时，那末教会所得到的成功只能认为是由于不可思议的原因所致，不能作别的解释^①。

培拉尔明的论据直到现在仍旧是梵蒂冈颂扬者们特别喜爱的武器，借以证明教会的“神意”的性质。例如，一位名叫保罗·卡立雅里的僧侣在他所写的“从近处看教皇——护教札记”一书中，承认过去有许多教皇是积习甚深的罪人，这还是客气的说法。这本书的出版是得到梵蒂冈当局的同意，赶上纪念“神圣的”1950年的。卡立雅里在谈到中世纪的教皇时说：

“事实的确如此，当教皇刚才即位，立刻把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安插在自己的周围，好象他唯一关心的是使自己家族致富和显赫。亚历山大六世、乌尔朋八世、里夫十世、巴维尔三世、亚历山大七世等忘记了他们是教皇，而只记得他们是巴尔特齐亚，巴尔比林尼，密奇契，法尔尼什和基特齐。他们的侄子们，甚至

① 现在梵蒂冈还有人记得，庇护七世似乎在回答拿破仑消灭天主教教会的威吓时说：“陛下，假如我们僧侣在二千年间，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尚不能办到这一点，那末您将也无法办到”。

年齡尚幼的和沒有任何优秀品性的，裁決着教會中重大和重要的事務。徇私這一污點（庇護親屬——作者）在教會歷史上持續了三百年”^①。的確卡立雅里說，教會的歷史不是一部寧靜的田園詩，而是戲劇，確確實實有許多卑鄙的教皇莊嚴地坐在“神聖的寶座”上；然而這事實本身就是教會系出于神意而產生的證明。因為教會假使沒有上帝的庇護，早已因不勝負担自己的罪孽的重荷而復滅了。“難道這不是奇跡嗎？”——卡立雅里及和他持相同見解的人質問道^②。

羅馬教廷的現代頌揚者們就是這樣地絞盡腦汁，將罪惡充作德行。

培拉爾明—巴斯托爾的“理論”在美國教權派歷史學者中特別受到歡迎，因為依靠這一理論，不僅很容易證明天主教教會的“神聖的”性質，同時能證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神聖性質。

美國教權派歷史學家梅納德在所著的美國天主教會史一書中指出：“可以完全肯定地說，天主教會中的雜亂無章證明教會是出于神意而產生的”^③。梅納德的同行——愛德華·華金同樣地寫道：“天主教在其具體的化身上（即指教會而言——作者）能夠降低的程度和能升高的程度相同；天主教在最良好的狀態時——是最好的，好到能表現出真正的基督教，在最壞的狀態時，比什麼還要壞。因此（！？）天主教是所有宗教之中最好的和最真實的宗教。”^④

其他的教權派歷史學家們，一方面承認許多中世紀的教皇是道德上的醜陋兒和欺詐者，說道：在非宗教的世俗事務上和在自己的私生活上，這些教皇確是那樣的，至于觸及宗教問題時，

- ① 保羅·卡立雅里：“從近處看教皇——護教札記”，米蘭，1950年，第45頁。
- ② 同樣的觀點見諸梵蒂岡當局同意出版的，供有文化的讀者閱讀的著作中，例如：海華爾德：“羅馬教廷史”，巴黎，1946年；黎吉·斯蒂芬尼尼：“天主教”，1952年。
- ③ 西奧圖·梅納德：“美國天主教史話”，紐約，1943年，第249頁。
- ④ 愛德華·英格倫·華金：“天主教中心”，紐約，1943年。

他們仍然是形式上忠实于教会的信条的；作为人而言他們是有罪的，但是作为教会最高級神职人員而言，他們是无可疵議的。例如，意大利教权派历史学家保罗·勃立齐就是这样議論的，他把教皇的伪善提升为最高度的德行。他并不否認許多中世紀的教皇是些卑鄙的人。他同意象这些事实——如約翰八世的被勒死、謝尔塞三世对福尔摩茲教皇尸体的凌辱、約翰十二世淫佚的生活、貝尼奇克脫九世将羅馬教皇皇冠出賣給格里哥里六世等等——証明了中世紀教廷的腐敗。可是立刻又补充道：“这些教皇中間没有任何人破坏委托他們监护的教义，没有任何人从教义的观点去批准不道德的行为……。总而言之，站在忠实于我們客觀的(?)教理的立場上，对教廷历史上这一需慎重研究的和引起爭論的时期可以作出結論說：不論教皇有着个人的弱点，羅馬教会仍旧是彼得的教会。”^①

虽然这种“論点”早被中世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嘲笑过了，特别是受到巴卡乔的嘲笑，可是教权派历史学者們(因为没有更好的)在今天繼續彈着这一老調。

教权派历史学把封建时代教会的活动理想化。

这种观点在意大利教权派历史經濟学者阿明托列·范范尼的著作中表現得特別明显，他現在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总書記。他在1934年初版的“資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天主教与新教”一書中，把封建主义說成是受天主教“公正”倫理道德思想鼓舞的一种制度，与資本主义作对比，而資本主义似乎是在新教的“利己”倫理思想影响下产生的。^②美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社会学者克劳宁持着同样的見解。^③可是范范尼、克劳宁和其他一些和

① 保罗·勃立齐：“羅馬教皇”，羅馬，1951年，第96—97頁。

② 阿·范范尼：“資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天主教与新教”，米兰，1934年，第105頁。范范尼的這本書已譯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西欧和美洲广泛流传。

③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原理，天主教教会的社会教义对于美国經濟生活的适用”，密尔賓基，1951年，第11—12頁。

他們一伙的人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天主教倫理道德在如何尊崇封建剝削一事避而不談。关于这一时期的教会和僧侶的“社会”活动，他們往往保持緘默。

教权派历史学者以及許多資產階級历史学者断言教会在殖民地中起过“积极作用”；似乎教会曾經保护过当地居民不受殖民者的压迫，在殖民地传播文化，以及介紹声名狼籍的“基督文明”。他們說天主教会曾起了某种阻碍作用，減輕了殖民制度所造成的慘禍。

某些教会的頌揚者們甚至企图証明教会曾力图在殖民地，特別是在美国，建立起理想的“基督秩序”，它类似卡姆柏尼拉的烏托邦式的“太阳城”，如果說这一试图未获成功，則罪責在于世俗的殖民者們的反对。阿根廷历史学者茄迪亚断言，例如，甚至西屬美洲的从殖民者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事实，应归功于僧侶們的传布基督教义和福瑪·阿克汶斯基“伟大的”理想，据說它在当地居民中有着广泛影响。^①

天主教历史学者企图把教廷为反对意大利統一而进行的斗争，把梵蒂岡和法西斯和納粹的同盟，以及現在梵蒂岡投靠美国的路綫認為是正当的。同时他們隱瞞梵蒂岡和天主教会与資產階級間的政治和經濟关系，把教会打扮成超階級的传播永恒真理的，其活动有益于社会上一切階級的組織。

教权派历史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是由耶穌会历史学者組成的，其著名代表之一为耶穌会会徒彼得罗·塔基一汶都里，他曾为墨索里尼的懺悔神父，著有“意大利耶穌会史”一書。^②在其仿巴斯托尔体裁的也是受里夫十三世委命而写的書中，塔基一汶都里将教会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耶穌会成立前时期和耶穌会成

① 欧列魁·茄迪亚：“殖民地和独立”（載危地馬拉地理历史学会年鉴，第二十六卷，第7—8頁，1952年）。

② 彼得罗·基塔一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二卷，第二版，羅馬，1950年。

立后时期。他认为教会在伊納息·罗耀拉 (Ignatius-Loyola) 之前的一切都是应被指责的，而在罗耀拉以后的一切都是可讚美的。塔基—汶都里引据了数以百计的原始资料，将罗耀拉以前的教会描绘成为污秽不堪的处所。他揭露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二世和巴维尔三世“罪孽深重”的生活。可是当罗耀拉和耶稣会一出世，照这位前墨索里尼忏悔神父的断言来说，就出现了奇迹。罗耀拉和耶稣会会徒“治愈”了教廷所有的癰疽和毛病。在所有上述的耶稣会的这一概念中只发现一个“可是”，这是因为耶稣会本身的活动犯了如此深重的罪孽，以至于象巴尔特齐亚及和其他类似的一些罗耀拉以前的教皇们的行为，同它比较起来简直象纯洁无垢的少年们所干的淘气事一样。这禁不住要问了：在这种情形下，耶稣会能治愈谁和如何治愈他人呢？

教权派历史学派另一个流派是由所谓自由主义天主教拥护者组成的。这可以举意大利科学研究工作者阿多罗·卡洛·叶摩洛^①和前已提及的美国人约瑟夫·马迪为例，他们是从事研究现代教会的历史的。自由主义教权派历史学者们对教会的政治活动予以批判性的估价。然而他们总归是信徒，他们企图证明教会并没有过时，教会是可以改正，适合现代潮流和健全起来的，同时教会是可能和应该在现代社会中起“积极”作用的。^②

恩格斯说过，宗教乃是“人所创造的，在它特有的全部真诚的狂热之中，即在初创时期，已非进行欺骗和歪曲历史事实不可了”^③，当宗教在衰落时，更非捏造历史不可了。天主教在这一

① 阿多罗·卡洛·叶摩洛：“近百年来意大利的教会与国家”，都灵，1952年。

② 现代资产阶级“非宗教界”的历史学和自由主义教权派的这一观点相互呼应。大多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发表同“理想”教会拥护者们同样观点的文章，即教会不仅要宣扬善行，并且还要躬自亲行。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拥护“健康”的教会，反对腐败的教会。实质上他们同教权派历史学者一样，是从理想的立场出发的。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莫斯科，1955年，第150页（俄文版）。

方面并不例外，教权派历史学派理論上的立足点即証明了这一点。

然而天主教历史学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客观的样子，不得已引了大量資料来作科学研究，其中不少資料和作者本来的意图相反，它們把梵蒂岡和天主教会活动的真正性質揭示了出来。

应该指出，近年来梵蒂岡的代表人物愈来愈甚地反对历史科学，反对历史主义。梵蒂岡在这一观点上是有它自己“重要的”原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胜利的影响，在天主教陣营内出现了所謂进步天主教徒一个派别，他們要求教会不要将自己的命运和必然要灭亡的旧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去和代表将来的共产党人結成同盟。我們看看和进步天主教徒进行辯論的耶穌会会徒安东尼奥·密西尼奥在梵蒂岡的杂志上是如何說明进步天主教徒們的綱領的：

“俄国领导的无产階級群众和以美国为首的資本家之間的民主斗争的結局，历史已經作出了。历史发展的結果必然是正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的和在夺取政权的无产階級获得胜利。新社会将声言劳动的胜利和劳动群众的胜利。所以除了投入历史的潮流之外沒有其他出路，为的是去竭力指导历史的流向，表达它的需要，将无产階級的事业取过来掌握在自己的双手里，和它的领导力量联合起来，去了解共产主义以及接受它的观点。

在进步的天主教徒的理解中，教会和天主教徒对馬克思主义思潮的‘伸手’政策应当不是一种多少有些謹慎的策略，而应是历史发展所导致的无上命令。拒絕这一政策，或更坏些是和保守力量联合在一起，意味着违反潮流开倒車，跳出历史圈子，从而宣告自己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无情的辯証运动将会把教会推倒，只因为教会不願去理解历史精神和拒絕立即去领导历史的先进队伍。”^①

这样，甚至連耶穌会会徒密西尼奥也被迫承認进步天主教

徒的观点是建筑在无可爭辯的事实上的。比事实还要坏的是，这位耶穌会的頌揚者答道：大家承認的历史是沒有的，因此也就沒有社会主义制度获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密西尼奧只承認一个“历史”，这个历史的主要人物就是上帝。沒有上帝的意志人甚至連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上帝創造历史；因此在密西尼奧的理解中，历史不会导至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将历史視作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一些发展較低的阶段为另一些发展較高的阶段所代替，又假如在历史事件中引用“肉体和物質相互关系的原理”，这就是說假如用真正的科学观点来代替神秘論和宗教故事时，那么“历史消灭了”，消失了，而这显然是一个爭論的題目。^②这就是教权派历史学現代代表人物耶穌会会徒密西尼奧的“邏輯”。

馬克思主义者对梵蒂岡和教权派反动政策有系統的有充分文件作根据的批判，不仅在过去和現在对教权派陣营的下层有着巨大的影响，使他們看清事实。在这一批判的压力之下，教权派領導集团也被迫迂迴作战，有时裝得比他們实际上还要“民主”和“激进”。这也反映在教权派的書籍中，因为它无法对进步陣营的观点保持緘默，而是應該起来与之辯論。于是，不管革除教籍和被視為异教，先进思想传播到教会不准进步人士进去的处所：天主教学校和組織，天主教工会，甚至传播到僧侶和寺院中間，它喚醒了理智，打破了过时的理解和战胜了世代代的偏見。

① 密西尼奧：“前进的历史”（載“天主教文明”，羅馬，1956年5月5日，第247頁）。

② 密西尼奧：“进步的預知”（載“天主教文明”，羅馬，1956年6月2日，第470頁）。

第一章

封建时代教皇的經濟活动

中世紀教皇的“善行”和恶行，被唯心論历史学者解释成为羅馬教皇的个人品質問題，在实际上有着远为深远的根源。中世紀教皇所扮的角色特別因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最大的大地主而决定的，教会所拥用的田产不少于全部天主教田产的三分之一。教会从思想上把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联合起来，尊崇封建社会中的統治秩序，首先就是尊崇对农民大众的剝削和奴役，因为教会本身对此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既然以教皇为首的“基督神秘的身体”——神学家是这样称天主教教会的——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利益和作为它的产物，那末可以根据教皇的經濟活动来研究它，准确地來說，是根据封建时代他的收入来源和支出項目来研究。

領導早期基督教公社的“先知”和“导师”們在布道时宣传穷困、节慾、蔑視世俗的財富和自我牺牲是进入“天国”的手段。他們和公社中的其他成員一样，不享受特殊权利。

二世紀末叶随着基督教中穩健派的胜利和教会組織的形成，主教便在教会組織中占首要地位，开始掌握公社中的財產和对外代表組織。主教們的威信和权力不是建立在他們的“道德声望”上的，而是建立在他們作为公社中的家政管理人，掌管它的物質財富上的。作为帝国首都羅馬的主教具有很大的經濟和